研究動態

美國女性史研究動向簡介

祝平一*

本文旨在於介紹美國女性史研究之動向，以便和對此問題有興趣的工作者交換資訊，藉收拋磚引玉之效。

女性史研究在美國的亞洲研究中已蔚然成風。去年（一九九三）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一四一個研討會中，和女性有關的幾佔半數。今年（一九九四）美國的歷史學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女性史學者，另外闢桌吃飯。從這些學圈動向可以看出，女性史已成為美國歷史主流中，一支強而有力的學脈。

反觀在亞洲方面有關女性史研究，則正在起步。遍翻八十及九十年代《東洋史研究》的近刊叢欄，有關女性史研究的專篇論文和單行本，依然寥若晨星。而《東洋學文獻類目》中，則尚未有女性研究的單元出現。這些簡單的指數，顯示出在亞洲方面，女性史研究仍然是一片有待開發的處女地。

問題是女性史何以在美國成為顯學？其價值何在？其實女性史的研究價值不言可喻：女性佔了一半的人口，僅僅這一單純的社會事實，便足以使得

*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 (UCLA) 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2 期（ 1994 年 6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女性史研究在學界佔一席之地；然而女性史長期受到忽略，以至今日仍需提倡，這和現今的文明社會的文化形態有關。大多數的文明社會，在其早期的歷史發展中，便已形成男性支配的局面，在這些社會裡，男女分工早已定形化，男性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使用。此外，他們還壟斷了文化的支配權：男性爲主的歷史家，爲男性的權力擁有者——帝王將相——寫作歷史。男性儼然成爲歷史的支配者，女性則被弱化爲第二性，默然噤聲，在歷史洪流中陪侍一旁。

在此文化態勢下，女性史研究自然趨向於探討男性長期支配如何形成，以及女性在種種社會體制中受到的壓抑，尤其在女權運動的風潮中，藉著學術研究暴露社會體制對女性的壓抑，更成爲喚起女性意識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這種研究取向，可從中國環環相扣的家庭、經濟與貞操崇拜三制度來加以說明：在家庭及婚姻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女性的唯一功能似乎是以其身體取悅男性，爲之延續下一代；而其個人的勞力生產則受控於家庭戶長手中。甚至她的丈夫死去之後，她仍要守節，不得再嫁；或甚在未嫁過夫家之前，她的身體便已是夫家的財產。在婚姻與家庭制度中，女性的身體、意志和勞動力皆受到男性的支配與剝削，對於女性的經濟剝削，並未隨著近代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有所改變。近代女性的勞動力雖已被動員，但其所填補的乃是男性所遺留下的邊際勞動力，基本的男女分工的模式並未改變，而納入生產秩序中的女性，則不斷在工作場合中受到歧視。

這樣的研究取向，似乎建立在男性與女性的截然劃分上：只要是男性便是支配者，女性則受壓抑。表面看來男性與女性的區別似乎很清楚：他們的生殖器明顯不同，而且這一生物性的定義，已成爲近代人了解男女關係的出發點；但是男女的界限真是如此自然而明顯嗎？近代西方同性戀的解放，模糊了男女的界限，亦使得女性研究者必須更深入追究「女性」到底是什麼。在這一關節上，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看問題的重要角度，因爲比較異時空下的文化狀態，才能看出各種文化中女性的生活和對於女性的概念是多麼不同；從而了解不同時空下，女性所面對的權力機制和其應對策略上的差異。

以「壓抑」爲主的女性史研究亦忽略了，要維持一個如此長久穩固的支配系統，所需的能量甚大。那麼這一男性支配體系究竟如何維持？如何運作

？而女性為何願意在此一系統下被支配？他們如何生存？在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以前，無法說明女性到底如何被支配，以及在這個支配系統下的男女關係。

女性研究的另一取向大致以反省這些問題開始，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則提供了新的思考基石。這一研究方向大體認為性（sexuality）與性別差異的認知，乃是各種形式的知識建構而成，法律、醫學、倫理學、家訓、宗教戒律、電視、電影等，都可以塑造吾人對於性與性別差異的認知，而且知識系統的建構與成形，無法與權力形態或擁有權力的群體分開，因為知識的建構，即是權力的運作，而權力運作又是構成社會秩序的要素。客體的存在，本身沒有意義，使客體意義定型，且被主體認知，同時使主體察覺自己的存在，則是知識的最大功能，因此吾人所認識的客體其實不是客體自身（thing itself），而是包藏在某一知識結構中的客體。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認知行為，都已含藏了意識型態的成份，蓋意識形態的建構即是以知識包裹客體，並使主體從認知客體的過程中，體認自己為主體，是以認知的過程不止是心理或生理過程，同時也是政治過程，而最細微的控制與權力運作，必然是從認知與控制知識的內化開始。換言之，知識不但賦予客體意義，同時也建立不同客體間和主體與客體間的關係，亦即知識不但賦予外界意義，同時也建立客觀的外在秩序，重要的是這不但不是隨意而不穩定的秩序，而且是合理的客觀存在，因為秩序的存在，乃是透過社會化過程將知識內化的結果。

這一思考路線，為男性的長期支配提供了線索，同時也顛覆了男女間的自然界限，男女的差別不是先天性的，而是人為的知識建構。這一研究路線亦揭露了，男性支配的歷史現象相當複雜，不是單一的權力中心所造成的，而是透過社會中不同的權力機構交織而成的一張密網，國家、學校、宗族、家庭、科學社群、文化媒體等，都是生產有關男女關係的知識的機制。

在這一研究取向下，知識建構、權力運作與女性間的關係成為研究的重點，例如，西方醫學史的研究發現，男女的生殖器官雖然不同，但是西方社會在十八世紀前，只有一性（one sex）而沒有兩性（two sexes）的觀念，當時人認為男女的生殖器官雖然表面不同，但其實一樣，只是女性的體溫較

低（也因此較低等）無法將生殖器官孵出體外。這一有關性的論述，爲當時社會公認，且體現在解剖學上，解剖學的證據說明了女性的卵巢與子宮，正好構成了一個凹入體內的男性生殖器。這一醫學論述不但說明了男女的差異，同時也合理化了男性的優越。但是十八世紀以後，從啓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等一連串思想與社會的變革，不但改變了男女關係，亦改變了人們對性的看法。反對女權者，認爲男女的生理結構不同，使得女性天生在體力、性格等各方面皆不如男性，是以男性應當掌握社會主導權；而贊同女權者，則認爲男女天生不同，女性有些特質如溫柔、母愛等皆爲男性所欠缺，是以應當給予女性與男性相當的權力。不論是反對女權者或是支持女權者，都從男女爲完全不同的兩性來談問題，而這一對於性的新論述，同時反映在解剖學上，此時的解剖學已不再將男女合爲一性，而將男女澈底從生理上分開。此後，科學權威日漸抬頭，解剖學的知識又反過來成爲強調男女不同的重要依據。

中醫有關女性生殖功能的論述，亦有異曲同功之妙。女性週期性的排血，使得中醫在論述女性時，將女性歸屬於虛弱的一性，而這一醫學知識，又可鑲入中國傳統陰陽五行的架構中，將女性歸屬於陰性，從而合理化男女的主從關係。

此外，法制史有關性犯罪與女性犯罪的研究，不但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當時人對於性的觀念，同時也了解女性在意識型態與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律條文與案件對於女性犯罪行爲的規定和判決，乃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將女性納入國家所期待的行爲規範。姑且不論社會現實是否符合這些論述，這樣的論述無疑是塑造吾人對於女性認知與對於女性行爲期待的一部份，從而產生規範社會秩序的功能。

有關女性的知識，塑造了不同文化下的女性形象與其合理合法的行爲模式。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女性卻過著各個不同的生活，例如一位女性在她成爲女兒、妻子、媳婦、媽媽，乃至婆婆時，其身分、地位與所面對的社會關係、權力結構都不一樣。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族裔、乃至不同職業的女性，顯然過著很不一樣的社會生活，面對著不同的問題。另外，有一群處於一般社會規範外的特殊女性，如妓女、女性僧侶、女罪犯等，則爲女性的「正

常行爲」，與「正常的社會規範」提供了一面鏡子。面對男性支配體制，女性在不同的生活層次中，亦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研究女性的生命歷程，及在此歷程中不同階段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不同類型的女性，和女性穿透男性支配的策略，不但提供了女性在不同生活處境下的資訊，而且透露了女性如何面對男性支配，從而增進了吾人了解男性支配機制的運作。

其他如帝國主義、族群（ethnicity）與女性間的關係（如有關慰安婦的研究）、文化媒體（電影、文學、電視，乃至廣告）對女性的塑造、空間配置（如廚房、閨房）對於性認知的塑造及對女性身體的約制，以及女性如何在語言（如家訓、女戒，乃至特定時空中對女性的稱謂等）中被建構、同性戀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從以上的簡介中，可以看出女性史是史學中相當特殊的分枝。這不但是因其所牽涉的問題甚廣，而且其研究範圍很難以目前社會經濟史／思想史／政治史等架構來分類。女性史可以說是遊走在各種歷史分枝的邊緣。女性史研究甚至改變了許多日常生活語言（如 sex, sexuality, gender ）的意涵，從而改變了人們對於性與性別差異的認知。此外，女性史研究不但要了解各種知識論述如何塑造人們對於性與性別差異的認知，而且要考察女性的生命歷程如何被放置在知識系統、權力運作和社會秩序的互動關係中。由於女性史研究的對象是人爲的知識建構，因此多數的研究者亦相當自覺其正在進行的研究，亦將建構他人對性的認知，改變原來的知識與權力結構。這一自覺亦促使研究者反省自己與研究對象（如慰安婦）間的關係，以及其研究所處的權力機制與所帶來的社會意涵（如有關婦女解放、女權運動、墮胎合法化、職業婦女的育兒問題等議題）。

這一取向的女性史研究亦帶來一個困局：女性既然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人爲的型塑，那麼女性研究者如何聲稱「女性」研究是一個獨立的範疇？而其研究成果與理論及社會意涵，是否只適用於女性而已？面對這些質疑，已經有些女性研究者與研究機構，開始聲稱其研究課題是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然而該趨勢是否會減弱女性史研究的特質，從而降低其社會意涵？總之，女性研究有許多理論與實踐上的課題尚待解決，但其興起則已是一股不可遏抑的趨勢，故其發展方向與對於歷史學的沖擊值得關注。